



毛泽东在和陈伯达、

艾思奇、关峰谈话

时说，《海瑞罢官》

的要害是「罢官」。

吴晗传

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佞幸覆乾坤

巫咸遍地逢冤狱

上帝遥天不忍闻

苏双碧 王宏志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吴晗传

苏双碧

苏双碧 王宏志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美娣
特约编辑 朱金元
封面装帧 孙宝堂

吴 晗 传

苏双碧 王宏志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插页 8 字数 346,000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8—02615—7/K·637

定价 26.10元

吳晗同志以一個勤奮治學追求
真理不斷進步的歷史學家和愛國
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
者的道路是本世紀我國知
識分子前進的光明大道

彭真

一九八三年十月



吴晗遗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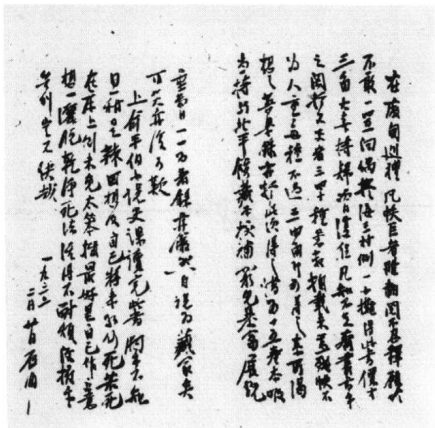
苦竹塘的家



在家乡做小学教员



清华大学毕业照



学生时代的手迹



30年代在清华大学任教

30年代病榻上的袁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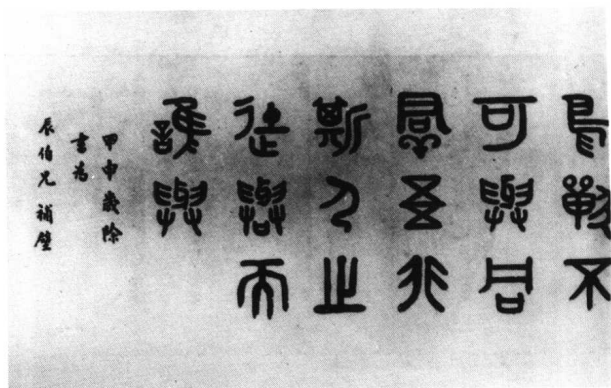
1945年,吴晗在西南联大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讲话



昆明“一二·一”死难烈士殡仪,前排中间的为吴晗



1946年,闻一多为吴晗题词





在闻一多死难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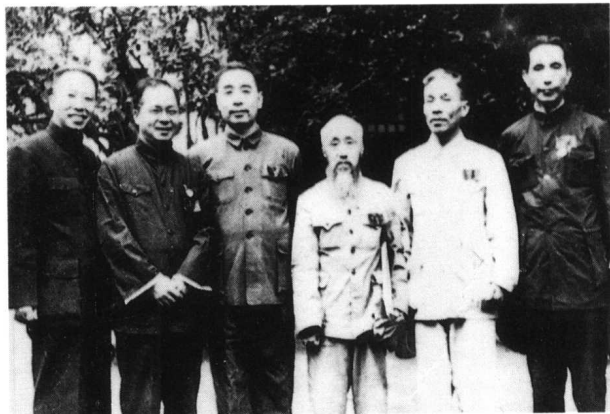


在清华园 12 号与袁震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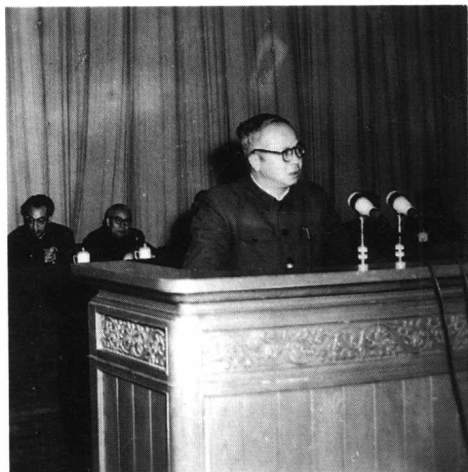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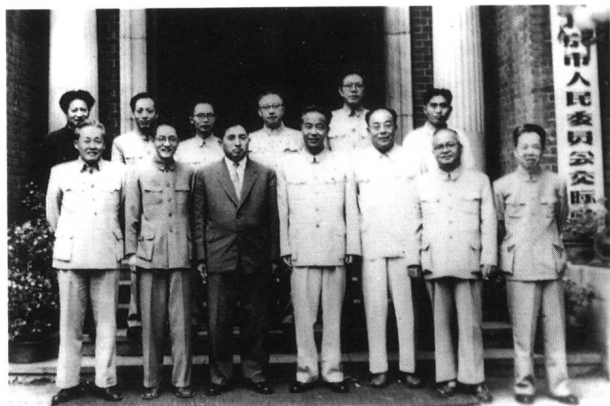


清华园 12 号

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上，与周恩来、沈钧儒、楚图南、翦伯赞、沈志远合影



与万里等北京市部分负责人合影



50年代后期吴晗作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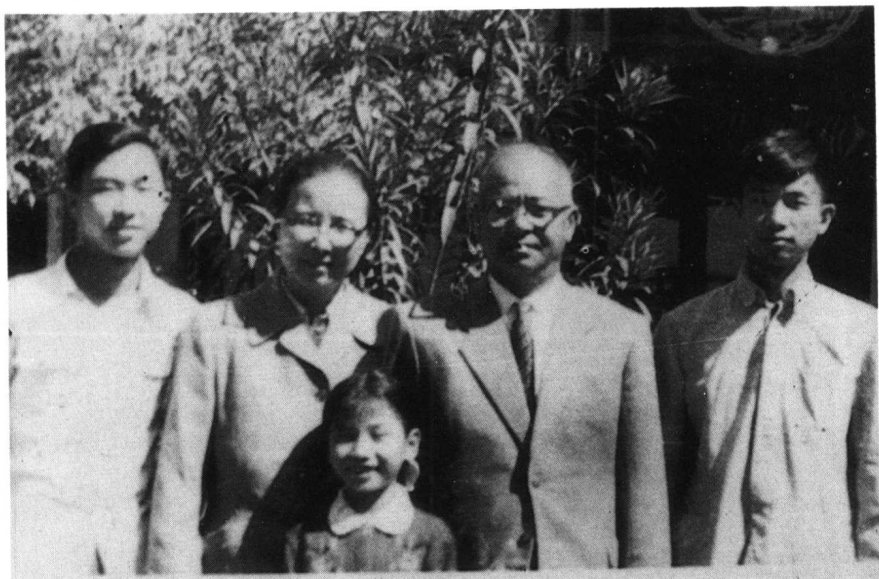
和宋庆龄与少年儿童一起欢度六一

吴晗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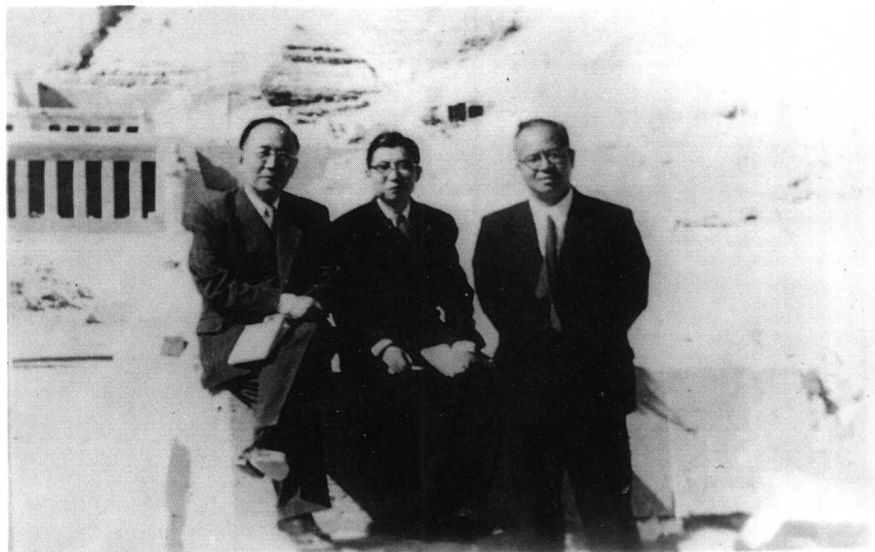
茅盾为吴晗题词





60年代·与家人在一起

1965年·和郭沫若等在埃及金字塔前





袁震和小彦、吴璋



原北京市副市长、反
文革中遭批斗

吴晗、袁震的追悼会



前 言

我们决定修订出版《吴晗传》，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此书于一九八四年出版，正值吴晗诞辰七十五周年，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书虽接连印过两次，但在市场上很快告罄。许多国内外读者来信查询，希望能得到此书，或建议重印此书；二是《吴晗传》出版时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也受作者视野所限，写作时对一些较敏感的问题或有意避开，或有意绕道从略。如吴晗在反右派斗争中、吴晗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吴晗一生的重大政治历程，在原著中都写得过于简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吴晗的遭遇，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他个人的遭遇，而是毛泽东为发动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即用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引发一场“文化大革命”，这是因为吴晗的特殊身份和身处特殊环境所决定的。拿《海瑞罢官》开刀，实质上并不是吴晗写《海瑞罢官》有什么影射或过错，因为运动的规模和运动锋芒所指和《海瑞罢官》以及彭德怀问题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

既然如此，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发难文章就必然是一篇陷人于罪、黑白颠倒的文章，至于舆论界的赞成与否也都不重要。拿吴晗开刀，是因为吴晗具备这样三个条件：一、吴晗是著名历史学家，可算学术权威，批判吴晗可带出一大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而这些在毛泽东看来恰恰是他要打倒的“走资派”、“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二、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属政界要员，批吴晗可带出“三家村”，并把矛头直指北京市委、直指彭真，批吴

晗是最好的突破口；三、吴晗是京官，对全国震动大。因此，吴晗成了这场政治斗争的倒霉牺牲品，吴晗本身的是非功过与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并不重要。因此，我们在写作本书的有关部分时，着重写吴晗在这场斗争中的经历、遭遇，并不着重分析他在这场斗争中的是非功过。只有把吴晗事件放在那个非常时期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才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吴晗受迫害的历史真相。

在原来的版本中，我们对吴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关经历写得很少，由于时代所限，有些写法也只好不能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如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炮制，说是林彪、江青所为，这样写当然不完全是事实，林彪在姚文发表前还未被当作“尊神”请出来，而江青不过是上窜下跳的小丑，也没有那样大的权力。其实，姚文元所奉的原始意旨，江青、毛泽东都先后有过说明，特别是康生主持编写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都有比较明确的记载。组织姚文元写文章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而不是江青的随心所欲，应当还历史于本来面目。在新的版本中，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我们尽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尊重史实。在吴晗所经历的几场重大政治斗争中，如新中国成立前的民主运动中，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涉及重大政治斗争的历史事件，吴晗的表现和遭遇，我们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写。

本书新版较原版增加了十来万字，主要是增加了“文化大革命”部分的文字；关于他的代表作《朱元璋传》，增加了一目。这里要澄清一个问题，即有的读者写文章说，吴晗解放后的《朱元璋传》是“为政治服务”的，连一点学术价值都没有。其实，解放前出过的版本《由僧钵到皇权》，恰恰是因为影射蒋介石而把朱元璋写得很不好，加上战争年代的作品，史料欠缺，错漏极多，说不上

有什么学术性。所以，吴晗曾一再说明他憎恶四十年代初期出版的有关朱元璋身世的两种版本。而一九六五年新版的《朱元璋传》，恰恰是没有很好领会毛泽东关于“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不要写得那么坏”的批评，而坚持一个正直史家的本色，在史料运用和尊重史实上下功夫，才招致江青一看到此书便暴跳如雷，扬言要批判此书。关于反右派斗争，我们专立一目，用了“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作标题，这个标题基本上较本质地反映出大部分知识分子在这场扩大化的运动中，积极参与并充当错误路线积极分子时的心态，吴晗也是如此。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个大动荡、大改组、大变化的中国，在这个世纪里，不论是吴晗他们那一代人，还是我们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一代人，或者比我们稍后一点的一代人，就知识分子的队伍而言，基本上都无例外地参与了这些动荡和改组，也都使自己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是爱国的，总希望自己的国家兴旺发达，繁荣昌盛。因此，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大部分人是变得更好，更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对知识分子总是过多苛求，把他们视为中间偏右或动摇不定的力量，划在教育、改造的群体之中，甚至把他们称之为“毛”，说他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就是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总要被当作革命对象的原因。然而，物极必反，广大知识分子在遭受十年动乱的浩劫之后，党和政府拨乱反正，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不论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都在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贡献。在知识分子中，那些

消极的,对国家对民族兴衰漠不关心的只是极少数。我们相信,吴晗、翦伯赞,以及邓拓、廖沫沙等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已成为过去,留下的只能作为一种永远难忘的历史垂鉴,告诫着后人不要再重蹈覆辙。在邓小平开创的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上面是重新修订出版《吴晗传》的一些想法,供读者阅读此书时参考,也请读者批评指正。上海人民出版社为此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和帮助,特致以衷心的感谢!

苏双碧 王宏志

一九九七年二月于北京沙滩